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挑战及策略

钟晓君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随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成为中国服务企业在全球配置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契机。分析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增长明显,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服务业各行业之间呈现依次有序发展之势;亚洲是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与此同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全球国家风险整体水平上升、服务业跨国并购比重较低、服务业对外投资现状与服务业发展阶段存在偏差是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应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完善服务业对外投资保险制度,逐步提高服务业并购比重,平衡服务业双向投资。

关键词:服务业;“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资本“走出去”;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 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4-0090-09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大批服务业企业开始“走出去”进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生产能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能与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带动国内服务资本全球化进程。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拥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1]。因此,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中国国内高生产率服务企业的规模与数量。伴随“一带一路”的深入建设,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将成为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关键力量。当前,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特征及趋势。研

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质量显著提升^[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平衡,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较多^[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顺梯度和逆梯度两个方向同时展开^[4]。这些研究专注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并未进一步细致到产业层面。整体而言,当前专门针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滞后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实践,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征与动向、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政府和企业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等关乎中国服务业资本健康“走出去”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深刻的解答。

收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服务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业国际化模式及经济效应研究”(15YJC790156);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及投资绩效研究”(2018A030313953);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对外投资安全与效益研究”(2018WTSCX084)

作者简介:钟晓君,经济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与国际经济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不再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而是将服务业单独剥离出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从产业层面考察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问题与路径。透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有效把握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动向与发展特征,深刻理解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得到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和行动指南。在分析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过程中,本文构建了服务业双向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分析框架,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本文对于指导各级政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进程,构建新时代下改革开放新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随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成为中国服务企业在全球配置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契机,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道路方向。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在书写“春天的故事”,并且展现出蓬勃的新时代发展特征。

(一)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增长趋势明显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前阶段(2007~2012年)。2007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期,当年服务业完成对外直接投资195.64亿美元;2008年,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额增长至460.99亿美元;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资本避险观望情绪日趋浓烈,各国资本普遍放缓对外投资的节奏,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也进入到一个起伏不定的阶段,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都受到较大制约。第二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阶段(2013年至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服务业资本“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

2013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689.81亿美元,到2017年飙升至1211.03亿美元(见图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5.11%,彰显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服务业走向世界所释放的重大战略与制度红利。“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前所未有快速增长期的全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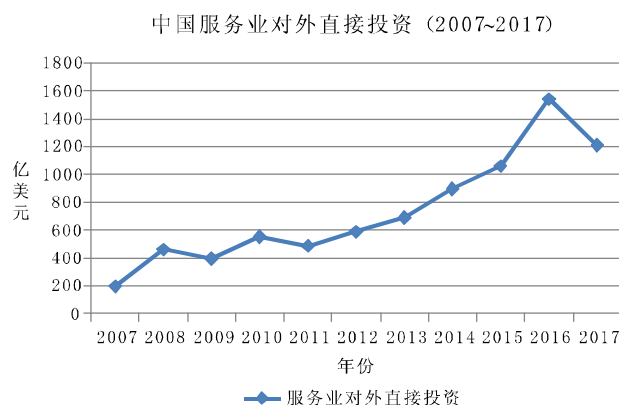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7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并制图①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重要载体

对比中国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核心与主力。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虽然在2011~2013年间有过短暂下跌,但此后即呈现迅速攀升态势,2017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达到76.51%,虽然相比2016年有轻微下落,但仍接近2008年82.46%的历史高位。图2显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仍存在不断提升的潜力和空间,说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内服务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与追寻服务客户,中国服务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重要的价值环节。与之相对应,中国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大体呈现平稳状态,近年来基本占据对外直接投资四分之一左右。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褪去,以及土地、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也开始提升,国内一些制造

企业开始在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布局企业与资本运营。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则长期在低位徘徊,其比重只占 1% 上下,这与中国是人口大国,大量农业企业仍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国内市场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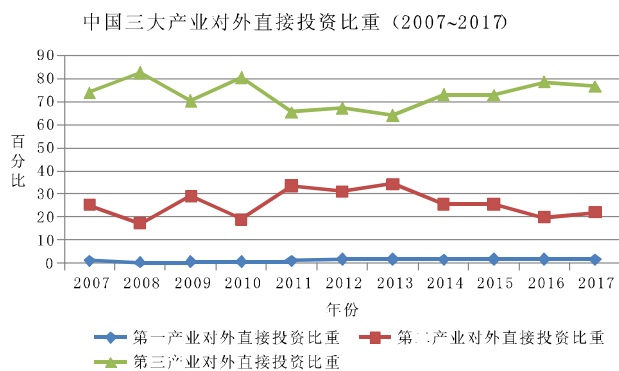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并制

图②

(三)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各行业之间呈现依次有序局面

鉴于中国各服务行业的产业基础、行业规模、开放进程存在较为显著的异质性,中国服务业“走出去”也应是有先有后、按照一定次序依次走向世界。那些产业基础良好、资金实力雄厚、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将率先在全球实现资源整合与配置;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竞争力尚不强劲的行业将首先立足国内市场,在夯实国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外投资(见表 1)。当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所占份额基本维持在 4 成左右。自中国加入 WTO 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商务活动的聚集地,国内众多租赁和商务服务企业逐渐成长并发展壮大,这些服务企业将其在国内市场积累的经验带向世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批发和零售业是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支主力军,其比重在多数年份都达到 20% 以上。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批发和零售业业态,新零售新业态形式层出不穷,国内互联网巨头借助在国内批发和零售行业建立起来的巨大优势,加紧在国外布局,积极争夺国外批发和零

售市场,掀起中国批发和零售业走出国门的热潮。

表 1 中国各服务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 (%)

年份 服务行业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78	5.76	5.20	10.23	5.25	5.07	4.79	4.65	2.57	1.09	4.5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55	0.65	0.70	0.92	1.59	2.10	2.03	3.53	6.44	12.12	3.66
批发和零售业	33.76	14.13	15.43	12.18	21.14	22.13	21.23	20.37	18.13	13.57	21.73
住宿和餐饮业	0.05	0.06	0.19	0.39	0.24	0.23	0.12	0.27	0.68	1.06	0.15
金融业	8.52	30.47	21.96	15.61	12.43	17.08	21.90	17.73	22.88	9.69	15.51
房地产业	4.64	0.74	2.36	2.92	4.04	3.42	5.73	7.36	7.35	9.90	5.6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8.66	47.11	51.48	54.79	52.40	45.36	39.22	41.02	34.21	42.73	44.82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55	0.36	1.95	1.84	1.45	2.51	2.60	1.86	3.16	2.75	1.9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1	0.31	0.01	0.13	0.52	0.06	0.21	0.61	1.29	0.55	0.1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39	0.36	0.67	0.58	0.67	1.51	1.64	1.84	1.51	3.52	1.54
教育	0.05	0.003	0.01	0.004	0.04	0.17	0.05	0.02	0.06	0.18	0.11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004	-	0.005	0.06	0.01	0.01	0.02	0.17	0.08	0.32	0.2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3	0.05	0.05	0.34	0.21	0.33	0.45	0.58	1.65	2.51	0.2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	-	-	-	-	-	-	0.002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

金融业是未来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增长极,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在 2008 年曾经达到 30.47%,虽然此后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无法遮盖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美好前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呈现显著下降态势,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制度与文化等较多障碍,于是越来越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企业开始缩减对外投资规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整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16 年比重一度飙升至 12.12%,反映出中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但 2017 年因受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裁与限制的影响,该产业对外投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降。与此类似的是房地

产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经过逐年增加,到2016年达到接近10%,2017年开始有所回落。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维持在2%左右。其余5个服务行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在1%以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迅猛增长,表明在党中央“文化自信”政策引领下,中国文化产业逐渐崛起,中国文化将搭乘“一带一路”春风散播到世界各地。

(四)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

亚洲是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地,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亚洲各国距离中国的“地理距离”较近,直接降低了中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生产经营的“有形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深刻影响亚洲各国,使得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心理距离”较为接近,有利于降低中国服务企业沟通与交易的“无形成本”,促进中国服务企业到当地提供服务产品。拉丁美洲也是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拉美各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同时具有较为可观的市场潜力、相对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成为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理想目的地。欧洲和北美洲是发达经济体的聚集地,完善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使欧美成为国外服务业资本青睐的目的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对欧洲的服务业对外投资将获得更加有利的环境。非洲具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战略延伸地,随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进程的深入推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非洲这个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将会更加密切,中国对非洲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将逐步扩大。中国服务业对各大洲直接投资比重数值见图3。

中国对世界各大洲直接投资比重(2007~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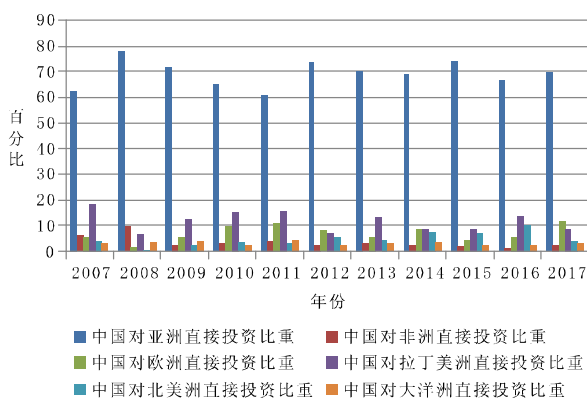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并制图^③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的深入使得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构^④,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摆在中国对外投资服务企业面前的诸多挑战需要谨慎应对。

(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对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形成较大冲击

自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逆全球化趋势而动,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采取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给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长带来严重消极影响。秉承“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执政理念的特朗普将中国视为阻碍美国再次伟大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并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为由,悍然挑起对华贸易战。贸易战的实质是特朗普政府通过限制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及限制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直接投资,企图将中国牢牢摁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阻碍中国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打乱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节奏,棒杀“中国制造2025”战略,形成美国控制高新技术产业、中国落入产业低端化的国际分工格局,进而扼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维持美国在政治、经济与科技方面的霸权地位。在中美两国大国博弈进入“修昔底德陷阱”阶段,中美在各领域的正面竞争与摩擦将越来越常态化与直接化,中国只能积极应对、坚决反击、直面挑战。

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贸易与投资霸凌主义将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消极影响。首先,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争将对全球经贸形势产生负面效应,破坏全球经贸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给全球经济复苏制造障碍,贸易战致使人民币汇率出现松动,提升了中国服务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成本。其次,美国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投资将直接降低追随在美国当地为中资企业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的中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数量与规模。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全面遏制与封锁中国”已由过去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战略清晰”,并在美国国内形成一致行动纲要。在此背景下,任何轻微触及美国敏感“战略神经”的中国对美服务业投资都将被视作“战略威胁”而被严加审视。服务业包含了大量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以及人民生活福祉的行业,如金融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命脉,房地产业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及民众基本生活保障,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关乎科技创新能力与国家竞争力,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根基,教育业、文化产业和娱乐业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关乎国家信息安全等等。上述服务行业都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将对来自中国的服务业投资采取系列限制,设置层层障碍,阻止中国服务业资本进入美国本土,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二)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容小觑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非洲也将成为越来越多中资服务企业的投资目的地。纵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族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基础设施条件

不尽完善,市场机制体制尚不健全。有学者较早发现相比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似乎存在“制度风险偏好”,较多集中于制度条件不太好而投资风险较高的地区^{[7][8]}。韩民春、江聪聪的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9]。宋利芳、武皖针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10]。如果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风险偏好”,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国有企业仍然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其主导的对外投资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导向^[11];二是中国企业在制度不完美的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12];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因此存在风险偏好假象^{[13][14]}。

当中国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这些“风险较大”国家的时候,其面临的投资安全威胁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于地缘政治变动、军事冲突、投资东道国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也可能来源于投资东道国经济发展不及预期致使经济违约频发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可能来源于当地民族与宗教问题频发以及恐怖主义外溢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及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由于法律体系和商业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法律风险。上述4类安全威胁都将对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挑战。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国家风险整体水平并没有随着世界经济增速的加快而有所下降,反而呈现轻微上升态势^[15]。日益复杂多变的投资安全形势将成为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比重有待进一步提升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绿地投资是在投资国建立全新的服务企业子公司,并为当地生产者或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相比于绿地投资,服务业跨国并购能够有效利用被并购企业的原有生产服务工艺和经营管理架构,从而有利于

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服务业跨国并购能够利用被并购企业对当地文化的熟悉与了解,从而迅速融入当地文化,降低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易成本。对于生产和消费同步进行、服务质量与客户体验高度依赖“面对面交流”的服务行业来说,被并购服务企业带来的文化代入能够有效克服绿地投资服务企业先天的“水土不服”和“文化隔阂”,从而使跨国并购对外投资在资本进入初期就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然而,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升。2017 年,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并购 200 宗,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中跨国并购金额比重仅占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0.13%。此外,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跨国并购行业差距较为显著,如表 2 所示,从并购金额看,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 5 个服务行业对外投资并购额占据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并购总额的 80%左右,其余服务行业无论在并购数量还是并购金额方面都差距明显。服务业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比重不高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益的提升,而各细分服务行业跨国并购比重的显著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了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内部的效益差距。

表 2 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并购情况(2017 年)

	数量(宗)	金额(亿美元)	金额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	55.8	15.2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2	61.2	16.77
批发和零售业	45	31.2	8.55
住宿和餐饮业	1	65	17.81
金融业	4	34.2	9.37
房地产业	9	25.2	6.9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8	63.1	17.2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8	11.2	3.0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	0.3	0.0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4	0.1	0.03
教育	3	0.1	0.0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	11.7	3.2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	5.8	1.5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	-
服务业合计	200	364.9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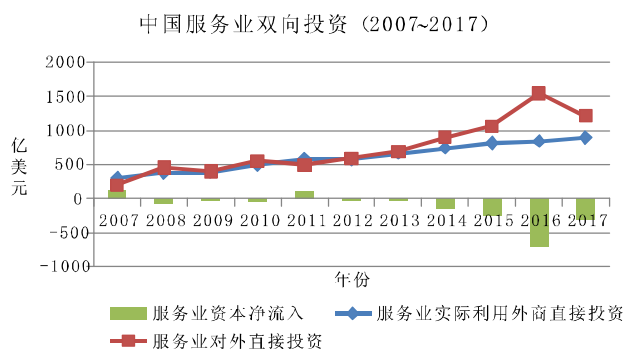
(四)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服务业发展阶段存在一定偏差

借鉴 Dunning^[16]的国家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本文构建了服务业产业资本的双向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框架(见表 3)。在服务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第一阶段:起步期),服务业利用外资数量有限,服务业对外投资更加稀少,此时呈现服务业外资的小量净流入;在服务业发展呈现一定规模后(第二阶段:成长期),服务业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服务业外资开始大举进入,同时,国内服务业资本也开始摸索“走出去”,在这一阶段,服务业资本呈现大量净流入,并且净流入数量不断扩大;随着服务业继续发展(第三阶段:成熟期),国内服务企业在与外资竞争中不断发展,一些本土服务企业获得了较强竞争力,开始在全球寻求与配置战略资源,此时服务业对外投资不断增加,并且增长速度高于服务业吸收外资速度,服务业资本净流入逐渐降低,直至服务业利用外资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基本相等,形成服务业资本流入与流出的短暂平衡状态。当服务业继续发展到一个较为高级的水平(第四阶段:繁荣期),此时本土服务企业在全球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本土服务企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在全球范围为客户提供服务,在这一阶段,国内服务业发展达到很高水平,服务业占据国内生产总值重要份额,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异常活跃,服务业呈现资本净流出状态,并且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当服务业继续向前发展时(第五阶段:再工业化期),大量资本走出国外,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愈发严峻,再工业化势在必行,此时资本流出开始减少,资本回流增加,服务业双向资本流向基本平衡,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表 3 服务业双向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服务业发展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服务业起步 期	服务业成长 期	服务业成熟 期	服务业繁荣 期	再工业化期
服务业对外 直接投资	几乎没有	有,金额有限	快速增长	大举流出	流出减少
服务业外商 直接投资	有,金额有 限	大举流入	增长速度下 降	缓慢增长	流入增加
服务业双向 资本净流向	资本净流入	资本净流入, 且不断扩大	资本流入流 出基本平衡	资本净流出, 且不断扩大	资本流入流 出基本平衡

从图4可以发现,2014年以前,中国服务业流入流出基本平衡,2014年以后,中国服务业资本双向流动呈现明显转折,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吸收外资则增长缓慢,服务业呈现资本净流出状态,且净流出不断扩大。根据本文提出的服务业双向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表明2014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第四阶段。在此阶段,服务业应该是处于高度繁荣时期,服务业产值应该占据经济增长重要份额。然而,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7.8%,2015年刚刚超过50%,2018年为5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仍未进入繁荣期的时候,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却提前具备了繁荣期才应具有的服务业资本净流出不断扩大的特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服务业具有资本扩展的冲动,一些服务企业在没有做好长远对外投资规划和充足突发事件预案的情况下跟随“羊群效应”走出去,伴随而来的是对外投资失败案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一些对外投资项目具有援助和帮扶落后国家的性质,资本走出去并不具有盈利性质^[7]。对于这类资本的“走出去”,更多是由政府进行主导,并不受服务业发展阶段的限制。



三、应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挑战的战略对策

面对纷扰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应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服务业互惠互利

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实现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稳健发展。

(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释放的政策红利对冲特朗普政府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给我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造成的不利冲击。在多边贸易体制与自由贸易体系依旧是世界经济发展基石和时代主流的背景下,美国逆潮流而动必将损害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世界各国利益,也给中国一个引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继续向前发展的良好契机。中国应该勇于迎接挑战,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促进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互联互通,搭建更加均衡的全球生产供应链。同时,继续改善国内服务业营商环境,建设开放的竞争性服务业市场,有层次、有节奏、有次序地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分工,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体系形成。

(二)建立与完善服务业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针对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各类安全威胁,应该构建完善的企业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同时加大服务企业对外投资事前风险预警,提高服务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有效降低服务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保障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性。此外,鉴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而投资目的地过于集中容易积累投资风险,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分散化投资策略,扩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多样性,努力搭建平台,将服务业对外投资向海外更多国家和地区延伸,避免投资目的地高度集中,规避将鸡蛋同时置于同一篮子的风险。

(三)逐步提高服务业跨国并购比重

跨国并购对于服务企业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加大对信息服务、科研设

计、金融等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企业的并购力度,充分利用跨国并购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带动我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打破国外服务业技术垄断。同时,加大对文化创意、教育、影视娱乐等企业并购力度,努力夺取国际宣传高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中国服务业实施跨国并购过程中,并购的目标和重点应该由获取厂房、土地等简单的初级资源向获取品牌、技术、人才等高级战略性资源转变,注重发挥跨国并购对于我国本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作用与效果。通过服务业跨国并购,助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

(四)平衡服务业双向投资

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服务业发展阶段存在偏差,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未进入第四阶段(繁荣期),因此服务业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平衡服务业资本双向投资,正确理解服务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对外投资两者的关系。利用服务业资本流入增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利用服务业资本“走出去”寻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具体来说,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招商引资,畅通服务业外资流入渠道,利用外资服务企业的“鲶鱼效应”,激活国内服务业竞争市场,培养中国本土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前应该做好尽职调查,充分了解对外投资风险以及国际化经营可能遇见的困难,抑制盲目的资本扩张冲动以及“羊群行为”,积极深入研判对外投资的收益,减少把握度不高的投资项目,将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失败风险降至最小化,促进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注:

- ① 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未单独统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系作者整理计算所得,整理计算方法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细分服务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总和。

- ② 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未单独统计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系作者整理计算所得,整理计算方法为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总和。此外,第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额。
- ③ 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未单独统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只统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地区流向,但是鉴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所占比重接近八成,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地区流向基本能够反映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

参考文献:

- [1]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2] Helpman E., Melitz M J, S R. Yeaple,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 300-316.
- [3] 杨挺,魏克旭,喻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特征及新趋势——创新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与实践的思考[J]. *国际经济合作*, 2018, (1): 18-27.
- [4] 聂名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与发展策略思考[J]. *国际贸易*, 2017, (4): 45-50.
- [5] 叶初升,闫斌. 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事实、大逻辑与理论启示[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 (5): 82-89.
- [6] 黄河. 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6 (3): 62-70.
- [7]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Liu, X., Voss, H. Zheng, P.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8] 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17-25.
- [9] 韩民春,江聪聪.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

- 要国家的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2):84-91.
- [10] 宋利芳, 武皖.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 2018,(3):149-162.
- [11] 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47(1): 26-34.
- [12] Morck,R., Yeung, B., Zhao, M.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3):337-350.
- [13] 杨娇辉,王伟,谭娜.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世界经济, 2016,(11):3-27.
- [14] 杨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 [15] 2017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发布,全球风险水平仍处高位[J].中国对外贸易,2017,(11):35.
- [16] Dunning, 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1,117(1):30-64.
- [17] 蔡家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7,(2):55-58.

【责任编辑:龚紫钰】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OFDI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ONG Xiao-ju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Abstract: As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in global market, "going ou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to allocate strategic resources global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to "go global".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related to OFDI of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shows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OFDI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hina's capital "going out".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in an orderly manner. Asia is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major challenges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face in OFDI are as follows: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is on the rise; national risks are getting higher globally; the proportion of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 servic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low;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direct invest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are not in ste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an all-around wa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urance system for Chinese service sectors to invest overseas, gradual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balance the two-way investment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Chinese capital "going out"; countermeasures